

# 危 急 存 亡 之 秋

## 蔣經國新傳之八

● 李甲孚（前東吳大學教授、自由作家）

### 情勢危急力挽狂瀾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一日，中共在東北的主力部隊，由林彪率領入關，平津先後變色，鄰近南京的徐州、蚌埠情勢危急。李志仁、程潛及河南省主席張軫先後要求蔣中正總統下野，蔣中正總統表示「個人進退出處，絕不繫懷而取決於國民之公意」（一九四九年元旦文告），接著決定將駐北平的國軍，空運撤到青島，以免無謂損失。在重要人事部署政軍措施上：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陳誠就任台灣省政府主席，一月十日，蔣經國趕往上海會見俞鴻鈞（時任中央銀行總裁），要俞氏將中央銀行庫存的黃金外幣移存台灣。六月十五日台灣省改革幣制，發行新台幣，舊台幣四萬元折合新台幣一元，新台幣五元折合美金二元。經濟也於是穩定下來了。

蔣中正總統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宣布「身先引退，以冀弭戰消兵」，依中華民國憲法的規定，將總統職權交由李宗仁副總統代行，李宗仁隨即發表文告，宣布就代

總統職。

蔣中正正在宣布引退前，對於鄰近台灣省區的人事作了一些安排：派朱紹良為福建省府主席兼福州綏靖公署主任，張發奎任海南特別區行政長官，湯恩伯為京滬警備總司令，陳誠兼任台灣省警備總司令，彭孟緝任副總司令等。蔣中正總統於一月二十一日下午四時，離開南京直飛杭州，蔣經國俞濟時等隨行，台灣省主席陳誠從台北飛到杭州迎接，二十二日返回奉化溪口，此後即以中國國民黨總裁地位處理抗共軍政大事。蔣經國時常跟隨在蔣中正總裁身邊，做蔣總裁的傳令人。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二日蔣經國記事年表記載：「奉蔣總裁命，致電參謀總長顧祝同，請其通知青島國軍司令官劉安祺，在未奉命令之前，暫勿撤離」，四月六日「奉蔣總裁命：對中央黨部就談事轉達補充下列的指示：（一）和談必須先訂停戰協定，（二）中共何日渡江則和談何日停止，其破壞責任由共方負之」。

蔣中正父子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七日飛澎

湖馬公，二十六日自馬公飛岡山轉高雄，六月一日蔣經國陪他父親視察高雄要塞，二十四日回到台北，當天晚上遷往草山居住。草山後來改名為陽明山。一九四九年七月十六日，中央決定設置「總裁辦公室」，蔣經國奉派任總裁辦公室第一組副組長，在草山辦公。十月十六日革命實踐研究院成立；院長由蔣中正總裁自兼。

蔣氏父子那一年做了許多辛酸艱苦的大事，力挽狂瀾。蔣經國自一九四九年元旦至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每天都記有日記，後來經國用「危急存亡之秋」的書名對外公開發表。書中記錄了許多政壇內幕秘辛，深受各方重視。

### 庫存黃金安全運台

先是白崇禧曾在漢口強迫中央銀行將運往廣州的銀元中途截回，一九四九年元月十六日，蔣中正並約見俞鴻鈞、席德懋二人，指示中央及中國銀行，有關外匯的處理要旨。為國家保留一線生機，避免庫存準備金落



① 一九五三年蔣經國（左）訪美期間在國務院與國務卿杜勒斯（右）會晤艾森豪總統。



② 析論時局。

到中共手中，二月十日，中央銀行庫存黃金白銀全部自上海運來台灣。代總統李宗仁於元月十七日命令中央銀行「不得將庫存黃金他運」事實上黃金早已安全運往台灣。

蔣經國對於御命會見俞鴻鈞運走黃金一事，在他手著「我的父親」一書，曾有一段說明：

「當上海快要撤退時，父親派我們幾個人到上海去，勸中央銀行把庫存的黃金，全部搬運到台灣來。臨行的時候，父親又再三叮囑我們千萬要守秘密，因為父親早已預料：李宗仁一定會以庫存黃金作為和談的條件之一。後來這一批黃金，很順利地運到台灣了。」

蔣經國把央行黃金搶運來台，外間知道的人不多。俞鴻鈞逝世後，王紹齋、章君毅撰「俞鴻鈞傳」，寫有「大陸撤守黃金運台」一段說：一九四八年底，大陸軍事逆轉，局勢迅速惡化，俞鴻鈞鑒於上海中央銀行庫存的黃金是國家金融命脈與唯一重要資產，毅然決定：排除一切困難和危險，將庫存黃金運往台灣，以策安全。

俞鴻鈞決定：由他本人和何善垣（央行機要主任）二人住在央行總裁辦公室後面一間小辦公室裡，辦理撰擬、核可、繕校、用印於一切必要公文，自始至終足不出戶；直到黃金安全搬運到海軍巡邏艦，解纜啟碇駛出吳淞口，外灘一帶解除交通管制為止。至於對外調用海軍艦隻，沿途部署警衛，實施

戒嚴等事，俞鴻鈞交給央行秘書處長陳延祚一人親自處理（見中外雜誌主編聖文書局發行的「俞鴻鈞傳」）。

將黃金自上海運走兩天後，申報出現了

一則簡短消息：「某夜：中國銀行（按為央行）曾運出物資若干箱」。日子一久，秘密就逐漸公開了，有一天，一位民意代表向俞鴻鈞當面質問道：「你把央行黃金運往台灣，是奉了誰的命令？」俞鴻鈞抗聲答道：「本人是中央銀行總裁，庫存黃金運存國內任何地方，我自有的權調度，無須請示」。幫同俞鴻鈞辦理黃金運台的何善垣，抗戰期間曾在軍統局人事處充任卡片科長，作者當時適在戴笠、毛人鳳身邊工作，和何善垣相識，其人辦事小心謹慎，循規蹈矩，一絲不苟。

經國對搬運黃金往事的評估是：

「政府在播遷來台的初期，如果沒有這批黃金來彌補，財政和經濟早已不堪設想了，哪裡會有今天這樣穩定的局面？古語說：無糧不聚兵，如果當時餉精缺乏，軍隊給養成了問題，那該是何等嚴重」。事實確實如此。

俞鴻鈞一九六〇年六月一日逝世後，嚴家淦發表談話說：「最使我難忘的是：大陸撤守之前，俞鴻鈞先生奉命將庫存物資包括黃金，安全運到台灣，這是何等堅毅？台灣能渡過最困難的一段時間，俞先生的貢獻是很大的」。

蔣經國著「我的父親」書中，還記有一

件同樣性質的事：

庫存黃金到達台灣之後，父親又記起：還有一箱國家的珠寶存放在中央信託局，父親又命令我們再趕到上海去，勸信託局把這一箱珠寶也運到台灣來，交給國庫保存。

這一箱珠寶，多半是抗戰時期，一班漢奸非法搜劫的財物，勝利後被政府依法沒收、交付中央信託局代為保管的。因為我曾經擔任過管制上海經濟的工作，知道這批珠寶存放的地點，所以父親就命令我去負責執行這一項任務。

當我到達上海以後，李宗仁已經知道了這回事，立刻下令不准移動這箱珠寶，後來竟吩咐那個保管保險箱的人飛到香港去，使我無法取出。

我因向父親建議：「據所知的情形，這一箱珠寶已經用了不少，剩餘的東西僅值三十萬美金，我們何必為此區區之物，同人家傷和氣。」父親卻指責我說：「到了台灣，當軍隊糧餉發不出時，就是一塊美金也是好的」。我聽了無言可答。

據作者所知：中央信託局保管的那箱珠寶，是一九四五年八月日軍投降後，軍統局長戴笠奉蔣中正主席命令；由他統一辦理全國肅清漢奸工作，軍統局的人在上海逮捕了一批漢奸，漢奸擁有的財產也依法會同當地治安單位及保甲長，當場點驗查封後，由保管委員會妥慎保管。上海一地所查封的漢奸逆產，其中就有鑽翠、首飾等，戴笠手下在

上海的負責人，爲了鑑別真偽，曾請珠寶專家分別鑑定後，把珠寶固封，由當事人一一簽名，其價值一律以黃金計算，一併加以註明。這批漢奸的逆產，戴笠後來都移送行政院在上海所設的「敵偽產業處理局」處理。

軍統局成立的「肅清漢奸案件處理委員會」主任委員爲軍法主任沈維翰，上海市負責逆產處理人，是上海市政府調查室主任王新衡，沈維翰來台後掛牌擔任律師，王新衡在任立法委員，兩人都是我在軍統局秘書室任職相識的舊日同事，來台後時有交往，可惜他二人早已過世了。

## 重振旗鼓自立更生

經國陪他父親到台北後，共軍仍在對國軍窮追不捨，華南、西南、華北相繼變色。國軍固守的防地，只剩下台澎金馬地區了。蔣中正以中國國民黨總裁身分，在陽明山創辦革命實踐研究院，檢討過去失敗的教訓，研究反攻復國的政經戰略。該院第一期開學後，蔣總裁兼院長，對於金門地位非常重視。他指出：金門距離大陸共軍陣地一衣帶水，在防衛台灣基地上，具有重大意義。必須堅強防守，經國理解了他父親的旨意，於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二日中午，急用電話向當時防守金門的湯恩伯說：「金門不能再失的，司令官必須就地督戰，負責盡職，並不能請辭易將」，經國那天的日記也說：「此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也」。十月二十五日金

門對岸共軍第二十八軍三個師集結了大小木船二百多艘，向金門西北角的古寧頭進犯，當天晚上就被湯恩伯打敗了。蔣經國十月二十六日那天的日記，又記下了下面一段話：今晨接湯恩伯總司令電話報告：金門登陸之共軍已大部肅清，並俘獲共方高級軍官多人。

蔣經國將這一戰報面報他父親後，奉命立刻自台北飛往金門慰勞前方將士，當天上午十一時半飛機飛到金門上空，經國俯瞰金門全島，心裡頓然有觸目淒涼的感受，飛機落地後，他立刻乘坐吉普車去到湯恩伯總部，他看見沿途都是傷兵、俘虜和士兵，心裡也引起陣陣感傷。他見到湯恩伯向湯傳述總裁慰勉的話後，立刻坐上吉普車到最前線，在砲火中慰問戰場上的官兵，他眼見處處都是血肉模糊的屍體，與仍在戰鬥中英勇作戰的官兵，萬分感動。那天下午四時飛離金門，當天日記寫的小結是：

金門登陸共軍之殲滅，爲年來之第一次大勝利，此真轉敗爲勝、反攻復國之轉捩點（有人寫成轉折點）也。

蔣經國寫的「危急存亡之秋」日記體的書，到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十二月三十一日日記寫了下面三段話：

美國參眾兩院本日通過「繼續援華法案」。

上午，父親仍在（日月潭）涵碧樓與本黨同志（按：與會的人有陳立夫、黃少谷、

谷正綱；等）繼續討論黨的改造案，父親認爲「改造旨在改造革命風氣；凡不能在行動、生活與思想精神方面，徹底與共黨鬥爭者，皆應自動退黨，而讓有爲之志士」去「革命建國也」。

父親抱著破釜沉舟的決心來改造本黨，無非欲重振旗鼓，自立更生，以達成反共復國之使命。

蔣經國接著寫下危急存亡之秋一書的總結，原文說：

決定國家生死存亡的一年，就在今夜過去了。流光逝水，馬齒徒增，僕僕風塵，自問所作何事？

往者不忍回憶，來者更必艱難，撫今察來，能不奮勵前進乎？時光不允許我們再猶豫了，事急寇深，坐而言不如起而行。

筆者屈指爲他算了一下，經國那年四十四歲，已到了不惑之年了！

## 政局獲得初步安定

蔣中正總統一九五〇年三月一日在台北復行視事。當天發表文告，大意謂：「進退出處，一惟國民之公意是從」，「當此危急存亡之日，因全體國民同胞責望之切，已無推卸責任之可能……。」

行政院長閻錫山接著率同各部會首長向復職的蔣總統請求總辭，三月六日國民黨召開中央常會通過提名陳誠爲行政院長，立法院於三月八日召開院會，投票同意陳誠組閣

，三月十二日蔣中正總統頒布行政院各部會首長任免令，政局自此獲得初步安定。三月十五日，蔣總統核定國防機構系統，共有三大要點：

(1)總統統帥陸海空三軍，(2)國防部長行使行政權，(3)參謀總長為執行官。三月十七日蔣總統明令，特任周至柔為參謀總長兼空軍總司令，孫立人為陸軍總司令，三月二十一日令派蔣經國為國防部政治部主任。他那年四十一歲，從蘇俄回國已十三年，蔣經國自此開始有了為民服務為國盡瘁的機會，在台灣一步一步的走上政壇。

世人撰文都說蔣經國三十九年（一九五〇）四月一日任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這是未明事實真相的記載。軍方最初發表蔣經國的新職是國防部政治部主任，當時的國軍政工，由國防部政工局主管，政工局長是黃埔一期畢業的鄧文儀（其人現在台北）。蔣經國接到政治部主任的派令，於四月一日正式就任；就在當天，國軍實行政工改制，經國備文呈准，將國防部的政工局改組為政治部。

經國接任之初，決心加強軍中政治工作，親自訂定國軍政工改制綱領，共有六大目標：(一)建立政治幕僚長制，(二)確立監察制度，(三)加強保障工作，(四)恢復軍隊黨務，(五)實行四大公開，(六)革新政治訓練。五月一日，「政治部」之上才加一「總」字，改稱國防部總政治部。蔣經國在任內訂立「軍事主管

任期制度」，規定主管一任兩年，得因情勢需要連任一次。一九五四年七月一日蔣經國任期屆滿，離職，在他四年任內，總政治部的名稱始終未變，後來才改稱總政治作戰部。

蔣經國離開國防部後的新職是國防會議副秘書長，蔣經國記事年表說他是「調升」，「遺缺由副主任張彝鼎升任」。張彝鼎是我早年熟悉的人，後來他從軍中退職後，和我在司法行政部共事，我了解他，是一個忠厚的人，蔣經國王任遠都同意張彝鼎去司法行政部任司法官訓練所長。

張彝鼎早在一九三四年，就在蔣中正委員長南昌行營任設計委員，設計會主委陳布雷、副主任委徐慶譽，委員有徐慶譽、張彝鼎、李毓九、高傳珠、徐道鄰、羅貢華、傅銳、何方理等二十人中。陳布雷說這二十人中「頗學冗濫，其真有學問見解，又能明識分際者，寥寥四五人而已」。一九三五年，蔣中正委員長決定修改侍從室組織，設一二兩處，第一處分設三組，掌管總務、參謀、警衛，第二處設秘書、研究兩組，置秘書八至十二人，以設計委員八人調任，張彝鼎就名列其間。

陳布雷說：一九三六年某日，「有工兵學校請頒訓詞」，錢大鈞（侍從室第一處主任）「不以寄余，而交汪組長（汪日章）與張彝鼎二人同擬，既擬就呈閱，蔣公中正見其草率幼稚，不可用，援筆批曰：『此等文

字，尚不夠中學生程度，何得率為轉呈？』錢大鈞「以代余受過，意甚不憚，余上山（廬山）始知之，然汪組長毫無內媿之心，余付之一概而已」（見陳布雷回憶錄）。

張彝鼎雖不能提筆為文，但他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畢業，是研究國際法有名氣的學者，用他當秘書寫文章，是沒有用到其人之長處！（未完待續）

### 編輯報告 編者

△本誌三二七期五月號「蔣經國與章亞若之戀」一文，第一二〇頁上段第十五行第十二字以下應為「蔣經國曾允諾選擇適當時機，偕同亞若返溪口探望生母毛太太人後，公開他們兩人的關係，不幸蔣母於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被日人軍機炸死，使經國極為悲痛，公開關係因而擱置。」特此更正。

△本誌三二八期第一段二十二行十二字以下應為「康兆民軍校三期畢業」。特為更正。

△三二九期三十六頁第三段二十一行為「下開萬代育萬方兮，一趨於同。」特此更正。